

德国当代最畅销作家

他们十个人

孔萨利克惊险言情小说集

孔萨利克(德) 著
杜新华 译

华夏出版社

他们十个人

孔萨利克(德) 著

杜新华 译

华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他们十个人/(德)孔萨利克著;杜新华译.

-北京:华夏出版社,2004.1

(孔萨利克惊险言情小说集)

ISBN 7-5080-3262-4

I. 他… II. ①孔… ②杜… III. 长篇小说-德国-现代

IV. I51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90552 号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:100028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

850×1168 1/32 开本 16.75 印张 417 千字 2 插页

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定价:22.00 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主要人物表

彼得·拉德克，25岁，中尉（皮奥契·米罗诺维奇·塞普金）

伯尔诺·冯·拉诺夫斯基，24岁，中尉（伊万·彼得洛维奇·布努里安）

埃尔马·索尔布莱特，22岁，少尉（鲁卡·伊万诺维奇·彼得洛夫斯基）

威诺·弗来海尔·冯·巴尔迪诺夫，28岁，上尉（莱奥尼德·日耳曼诺维奇·杜斯科夫）

约翰·波特曼，21岁，少尉（费德烈·潘特利耶维奇·伊万诺夫）

迪特里夫·阿德勒，25岁，中尉（亚历山大·尼古拉耶维奇·克拉什金）

阿斯加德·库恩贝克，28岁，上尉（基里尔·塞莫诺维奇·波拉诺夫）

迪特里希·塞姆波，22岁，少尉（谢尔盖·安德烈耶维奇·塔斯基）

博多·冯·拉比茨，31岁，少校（保尔·费多洛维奇·萨索诺夫）

亚历山大·达尔布尔格，20岁，候补军官（尼古拉·安东诺维奇·普莱金）

拉丽莎·亚历山德洛夫娜·克鲁兰科娃，22岁，拖拉机手

莉拉·保罗夫娜·沙伦科娃，20岁，电车司机

安娜·伊万诺夫娜·普莱斯金娜，29岁，医生

柳德米拉·德拉格米洛夫娜·契尔斯卡斯卡娅，26岁，民警少尉

万达·西蒙诺夫娜·哈勒，23岁，建筑队工长

叶琳娜·鲁金尼什娜·普什金娜，19岁，克里姆林宫中秘书

伊果尔·弗拉基米洛维奇·斯莫尔卡，40岁，苏军上校

叶费姆·格利高里耶维奇·拉多夫斯基，52岁，红军联络部将

军

弗拉基米尔·莱恩蒂耶维奇·普莱西科夫斯基

尼古拉·伊里奇·塔布恩

安东尼·瓦西里耶维奇·努拉斯维里

斯大林

I

没有人来接他们，因为没有人期待他们的到来。

在越过边界、经过所谓的人民警察的最后一次检查之后，他们终于登上了由东德开往西德的火车。他们站在最后一节车厢的窗前，默默地注视着一闪即逝、果实累累的田野，干干净净的小村庄，整齐的街道和五颜六色的小汽车。它们有时和火车并排开上一段，仿佛这一切都是火车和汽车之间的一场赛跑。一个上岁数的男人踉跄着穿过通道，高举起双手，大力推开车厢的门，兴奋地大叫大嚷：“我们到德国了！我们到德国了！我们终于到了！”只要是他伸手可及的人，他就去拥抱他，亲吻他的双颊，之后他精疲力竭地倒在通道的一扇窗上，把脸紧紧地贴着花纹玻璃，轻声地哭了起来。

他们是四天前从莫斯科出发的。但是，在这之前，啊，他们还经历了一幕告别的场面，那是他们人人都害怕的。这一幕发生在他们集中的营地，他们所有人，所有“卑鄙无耻的混蛋”——人们这样称呼他们——都被送到了那里。他们从四面八方拥来，带着女人和孩子，带着箱子、大纸箱和麻袋，把一半或是四分之三的家当都打在“手提行李”里——按照出境许可证上的规定——然后，他们一个挨一个地站在木板房前。他们是二十七个男人，都带着妻子，还有五十二个孩子，此外还有七个老头和九个老太太。他们盯着专员同志，静悄悄地听他说些什么。

“你们这些人！”这个自称基里尔·阿波拉莫维奇·科诺波耶夫的人说。这是个大块头的男子，面颊松弛，像一头胖胖的仓鼠，一对小眼睛隐藏在肥肉中间，几乎看不见。他脚踩一双漂亮柔软的马靴，上身穿一件宽大的深蓝色皮夹克，下穿一条棕色裤子，长着一头灰色的卷发，当他要说什么重要的事情时，总要搔一搔头，“俄罗斯养了你们多少年，嗯？！多少年来，俄罗斯就像你们的父母一样照顾你们！凡是一个人所想要的，你们不是都得到了吗？站在你们身后的，难道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？苏联难道不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安全的地方？可是，不，不……你们还是要离开这里！跑到资本主义的西方去！活了大半辈子，你们倒又想起你们是德国人了！德国人！”科诺波耶夫像往墙上吐了一口痰一样吐出这个词儿。然后他走动起来，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，在这一群沉默的人面前走来走去。他在每个人的面前都停留一会儿，用一对小眼睛上上下下地打量他。“你们希望西方能给你们什么呢？”他质问道，“他们有什么地方比我们好？我们是第一个征服宇宙的，无论在科技上，在医学上，在控制论上，在数学上，在农业改革上，我们都是领先的。谁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棋手，嗯？！最优秀的运动员？！最强大的军队？！啊，我哪儿数得过来啊！数到明天也数不完！可是这对你们有什么用呢？！你们站在这儿，带着你们的破烂家当，心里想：就让他说去吧，这位老实听话的基里尔·阿波拉莫维奇同志——我们可是德国人！这一点无论他说什么也改变不了！”他朝一只箱子踢了一脚，短促地笑了一声。长时间的谈话令他疲惫，因为这样他的心脏就要剧烈活动，而他的心脏已经肥大得不可救药了。“你们给俄罗斯留下了什么？！只有耻辱！”

科诺波耶夫又激动地讲了一个小时，可是无论是孩子还是老人都没有动摇，而那些正值“最佳年龄”的男人和女人，对他这番理智的讲话更是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。之后，这些自愿移民者

一个接一个地走进办公室，去办理最后的一些文件：车票，在允许德裔移民的许可证上盖上最后一个章，在保证他们对俄罗斯没有任何要求的文件上签下有效的签名，最后是越过边境的许可，以及允许他们那被检查过多次的行李出境的许可证。

这些移民者中，没有一个人能像个真正自由的西方人那样，买得起一张飞到德国去的机票。就连国际列车的车票也没有一个人买：他们都准备一起乘坐一列特别列车离开俄国。到波兰之后，他们必须从俄罗斯的宽轨列车换乘欧洲的普通列车，到民主德国，之后再换车，经图灵根，穿过两德之间的边界，到自由的西方去。

自由的西方？

科诺波耶夫可不这么看。在办公室里，他坐在堆积如山的文件后面，人们一个个走过他的写字台，他把他们的个人档案从文件夹里抽出来。“啊哈！是您！”当一个中等个子、头发花白的男子走到他的写字台前，把旅行证件放到他桌上时，他叫道。科诺波耶夫抬起眼睛，两个男人的眼睛相对了。然后他把眼光转到这个男人身旁的女人和另一个年轻姑娘的身上——按照文件上写的，这是他两个女儿中的一个。“您是个聪明人，基里尔·塞莫诺维奇·波拉诺夫。我们的前名是一样的。这使我们有点像兄弟！您解释一下，为什么您在三十四年后突然变成了德国人。”

“我一直是德国人，基里尔·阿波拉莫维奇……”这个男人用食指敲敲他的证件，“这上面写着：我叫阿斯加德·库恩贝克。德国国防军上尉！”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。”科诺波耶夫的胖脸有些扭曲，好像吞了一口变坏了的油。“您提出了愚蠢的申请，于是一切都真相大白了。您成功了，是不是？您被判流放西伯利亚十年！三年之后，在西德政府的干预下，您得到了赦免。可是，三十四年来，您作为一个俄国人生活在我们中间，而且您过得很好，还在莫斯科电

“他是我的父亲，”塔玛拉·基里罗夫娜也同样郑重地说，“他做的总是对的。”

“您倒是把您这一家子牢牢地掌握在手里了！”科诺波耶夫说。他翻着文件，一张张地签上名字。“您想在德国做什么工作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您以为，德国的电车公司还在等着您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或者，您还想当军官？”

“那我可太老了。”

“您当然太老了，无论做什么也太老了！特别是移民，您太老了！在这里，在苏联，您本来可以安度晚年。而在西方呢，您就像是一只讨厌的虫子，趴在一滴蜂蜜边上。他们会把您看成一个废物，因为您得靠别人养活。人们会说，他回来干什么，他应该待在俄国！现在我们还得养活他，用我们交的税来养活他！三十四年后，他记起自己是个德国人了。这头讨厌的老狗！”科诺波耶夫向前探着身子，下巴仰得高高的。尽管在莫斯科热浪翻滚，空气简直变成了一点就着的煤气，他还是穿得很正式，衬衫扣得严严实实，还系着领带，打了一个粗大的结。“您会变成一个多余的人，基里尔·塞莫诺维奇！金钱至上的西方人是没有心的，对一个像您这样的人是没有心的！您是作为一个老人，回到一个您再也不认识了的国家！一切都变了，一切！在那里，谁要是在劳动中再也派不上什么用场，就还没有一根弯钉子值钱！他们懂得什么叫灵魂吗？哈，不！在他们本来该长着良心的地方，贴着的是一张钞票！什么自由，那是当官的来决定的。我知道您现在在想些什么！我在看着您的眼睛！‘跟这里一样……’是不是？”

“这是您说的，科诺波耶夫同志！”库恩贝克谨慎地说。

“我们是自己人！我问您，西方有什么好的？您以为他们会付给您军官退休金吗？”

“走着瞧吧！”

“好多事都得走着瞧。特别是，您以后会发现，您离开俄罗斯是个错误。您在这里就从来没感到过幸福吗？”

库恩贝克点了点头。他拉过他的妻子和女儿，把她们拉到自己身边。这是一幅美丽的图画。一个可以为之自豪的家庭。当他站在他的花园里时，他常常感受到这一点。他住的房子在莫斯科郊外的新住宅区，政府在森林里辟出了大块空地，建起了漂亮简洁的小房子，租给业绩良好的干部和表现突出的同志。当他眯起眼睛瞧着太阳，瞧着他长满了樱桃和蔬菜的花园时，他感到自己是幸福的。

“我爱俄罗斯！”库恩贝克说，“离开它我也很痛苦。”

“可您还是要走？”科诺波耶夫呼吸沉重。“您病了，同志。您的灵魂病了。”

“在一个人的一生中，总会有这样的时刻，他想还他的本来面目。对大多数人来说，这只是一种渴望——他们还会继续按照他们已变成的样子生活下去。而我却有了重新成为一个德国人的机会，难道我应该让这个机会白白地溜走吗？”

“您是个傻瓜，波拉诺夫！”科诺波耶夫重重地把一个章盖在一份文件上，这上面已经有很多章了，它一定是一份重要的文件，因为一份文件上的章越多，就越会让人对它肃然起敬。“您知道这是什么吗？”

“一个章！”

“这说明您作为一个俄国人已经死了！现在您什么也不是，直到德国人承认您。这个章——哼！——让您解脱了。再也没有基里尔·塞莫诺维奇·波拉诺夫这个人了！您的新名字阿斯加德·库恩贝克还只是个文件上的符号……这名字是您自己说的，却无

法得到证实，您的政府也只是含含糊糊地承认了它！从现在开始，您和您的家庭就是个零了！”科诺波耶夫把文件从桌子上推给库恩贝克。“您现在感觉怎么样？”

“我很悲伤，我得承认。”库恩贝克把文件折叠起来，放进衣袋里。“所有手续都办完了吗？”

“都办完了。”

“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走？”

“明天一早。列宁格勒火车站，第三站台，最后一节车厢。是专门给你们这些新发现的德国人预备的！”科诺波耶夫咳嗽了一声，向后一靠。“没有回程票。”

“这我很清楚！”

“那么您可以走了！”科诺波耶夫用尖锐的高声说，“您踢了您亲爱的俄罗斯的屁股！让我感到安慰的是，在西方，直到您生命的终结，人们都会不停地踢您的屁股。”

这是四天以前的事了。

现在，他们正驶向他们梦寐以求的德国。他们在贝布拉换了开往图灵根的列车，目的地是弗里德兰。那个靠在窗上的老人还在哭泣。他是个农民，名叫赫尔伯特·齐默曼，为了让政府批准他移民，他已经努力了七年。他一下子不敢相信，他终于来到了这个国家。大约一百年前，齐默曼家族就是从在这个国家迁徙到伏尔加河畔去的。库恩贝克和他的妻子莉拉、女儿塔玛拉也站在窗边，注视着外面一闪即逝的景色。

“你的国家很美丽……”莉拉·保罗夫娜在长久的沉默之后说。丈夫的沉默让她感到巨大的不安。越过他的肩膀，她瞥见了塔玛拉。这姑娘点点头，指着外面一辆汽车，它跟火车并排开了一段，然后拐到一条公路上，不见了。

“一辆黄色的汽车！看呀，纯黄色的！”

那是辆邮车。库恩贝 克揉了揉眼睛。“变样了。以前的邮车是红色的……”

弗里德兰火车站停着一辆小面包车。

等着他们的有两个红十字会护士，一个卫生员，一个警察，还有一个官员，他自我介绍说是营地领导派来的代表。他们陪着这一小群拎着大包小包的人上了汽车，开向一片石头建的简易房。在办公室前面的空地上，车停了下来。那个卫生员是个快活的小伙子，一直坐在库恩贝 克旁边。这时他高声叫道：“我们到啦！你们成功啦！欢迎归来！”

之后他们就站在阳光下了，这里像莫斯科郊区一样热，只是空气中没有鲜花和蔬菜、香料和水果的香气。当阳光照耀着基里尔·塞莫诺维奇的小花园，当他拖着橡皮水管在花园里走来走去浇水的时候，空气中就弥漫着馥郁的香气。

“简易房。”莉拉·保罗夫娜说。此时她说的是德语，因为她在德国了。她说的德语很生硬，当她说“简易房”这个词的时候，就像是一块干木头被从中折断了一样。“自由在哪里？这和科波谢瓦的简易房一样。”

鄂毕河畔的科波谢瓦。大名鼎鼎的劳改营。一片低矮的房子，一群活着的死人。到科波谢瓦去的人，都是被人遗忘的人。

库恩贝 克把行李拿下车来，除了皮箱外还有三个大纸箱和一个大麻袋。他把行李堆在妻女身边，然后用双手捧起了莉拉的脸。一阵温柔涌上他的心头。他吻着她的眼睛，抚摸着她的脸颊。“科诺波耶夫是怎么说的：我们还只是一个零！——在这里他们会把我们变成一个数字！我们还不知道公事是怎么回事吗？这只是走个过场，莉拉妮亚。我们得先跟他们说清楚，我们想去哪儿。只需要几天，一定的。”

营地管理部门的一个职位高些的官员向他们致了简短的欢迎

辞，他强调说，他们确实已经回到家乡了。他们走过了一段艰难的路，但是还有一段艰难的路摆在他们面前，因为，尽管他们都是德国人，但他们现在是在一个陌生的国家，一个和俄罗斯完全不同的国家。但是用不着害怕——大家会给他们提供所有的帮助，直到他们适应为止。

接下来是分配房间。库恩贝克一家分到了两个房间，但是只有一间有淋浴。这个大营地很空，大部分的简易房屋都锁着。回乡大潮已经过去了。在弗里德兰，回乡战俘们的欢呼声已成为记忆，大潮过去之后的几滴水，大家几乎感觉不到了。

在食堂里，他们领到了晚餐。面条，土豆烧牛肉，甜食是香草布丁和覆盆子果汁。饭后他们出去散步，在钟楼边站了一会儿，看了看著名的弗里德兰大钟。他们还来到了营地的小广场，为了装点这里，人们建了花坛。晚霞中，他们在花坛前的白色长椅上坐着。当晚霞变得黯淡，营地里一盏盏灯亮了起来时，他们才回到房间。他们打开箱子，取出换洗衣服来。先是塔玛拉洗过了澡，换上了短短的睡衣。然后是库恩贝克，他站在哗哗的水流下，用肥皂抹遍了全身，然后等着，等莉拉来替他。她的身体还是那么美丽，他想。真的，她还比得上年轻人呢。光滑而结实的皮肤，坚挺的乳房，身上还找不出一点多余的脂肪。我们结婚已经三十四年了。上帝啊，多么漫长的一段时间啊！而我还像认识她第一天一样爱她。和她在一起的日子里，我没有一秒钟懊悔过——可是她呢？和我在一起，她幸福吗？她都跟我一起经历了什么呀：年纪轻轻就恋爱，结婚，然后发现了一个令她痛苦的事实：我是个德国人。生塔玛拉时难产，她差点大出血而死。她一直担心我会被发现，没过几年好日子，她又煞费苦心地想打消我回德国的念头。接下来是提出申请，受盘查，关押，拷打和判决。在西伯利亚的岁月，赦免，然后再提申请，再一次受到威胁，再一次受盘查，直到他们说：“好了！您可以回德国了！”今

天是在弗里德兰，新生活的第一站。又是简易房，在营地大门外面，有那么多她完全不认识的东西，等着她去征服。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，虽然它叫做家乡。莉拉妮亚……在这三十四年里，我都给你带来过什么呀……

他把她拉到喷头下面，拉进自己怀里，吻着她。她的光滑的裸体紧贴着他，水哗哗地流下来，顺着地漏流走了。

“基里路什卡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！”她问，紧紧地抱着他的光身子，像是为了掩盖她的害怕。“你疯了！要是塔玛拉进来了怎么办！你这头老狗熊！别这样，我说！整个房间都要被水淹了，你还得付修理费！基里尔——我们可不是二十岁的人了。”

她笑了起来，发出了咯咯的笑声，享受着他温存的爱抚。当他吻着她的乳头的时候，她就像回到了青春时代那样叹着气。他把她推到墙上，并且把她的腿分开，她喃喃地说：“你这头发疯的，发疯的熊！”她推开他，压低了声音笑着，扔给他一块毛巾，浑身滴着水跑到门边，把门锁上，然后开始擦身。身上刚一擦干，她就倒在了铺好的床上，充满期待地看着她的丈夫。

“仿佛又回到了好多、好多年前，”当他向她俯下身子时，她轻声说，微微有些哽咽，“回到了德国你高兴吗？”

“我爱你，莉拉什卡。我一年比一年更爱你。我……”他把脸埋在她颈窝处，不说话了。他想占有她的感觉就像三十四年前一样强烈。那是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长满青草的小山坡上，他第一次拥有了她。在他们头上是一望无垠的蓝天，当他感觉到她滚烫的皮肤紧挨着他的时，天空仿佛也歌唱起来了。

如果她拒绝回来，我会留在俄罗斯的。他想，感到她的嘴唇落在他的肩膀和脖子上。可是她从来没拒绝过我什么。在她的眼里，我做的一切都是好的。她从来没抱怨过，从来没指责过我，从来没提出过异议，尽管在她看起来我做的好多事都是错的，因为，见鬼，谁是十全十美的呢？！可是她从来没表现出来过！她

就是这样一个女人，永远信任和崇拜她的丈夫，即使他有无能的时候。

他们又冲了个澡，把门锁开了，重新倒在床上。四周一片静谧，比他们在莫斯科郊外的小房子静得多了，因为他们有个邻居总搞聚会。也比科波谢瓦的劳改营安静得多，在那里，一到晚上，便能听见简易房里的哭泣声，悲嚎声，喃喃的祈祷声，热烈的议论声，呼噜声和叽里咕噜的咒骂声。而这里静悄悄的，是一个声音的真空，静得压抑，这份静走进了他们每一根神经。他们想睡了，他们已经累得像被撵得精疲力竭的狗，可是他们睡不着，因为太静了。

“德国的第一夜！”莉拉·保罗夫娜说。她一个人躺着，因为房间里摆的是两张单人床。“我害怕，基里尔。什么声音都没有，只有我们的呼吸声。”

“等我们出了这个营地就不一样了。外面的世界是很吵的。”

“比俄国还吵？”

“吵得多了。相比之下，俄国就像一个空荡荡的教堂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我这么想。看看外面的交通就知道了！”

“我们会住在一个大城市吗，亲爱的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你在申请里提的是科隆。科隆很大吗？”

“很大。”

“比莫斯科还大？”

“小得多了……”

“那你怎么说它大？”

“在德国人的概念里科隆就很大了。”

“那么德国的一切都比俄国的小了？”

她的推理在逻辑上倒是无懈可击的。他想了想，在黑暗中微

笑了。“是的，”他说，“德国什么都小。”

“那么德国为什么比俄国强大呢？”

“谁说的？”

“都这么说。美国，德国，法国……都比俄国好！”

“这和国家的面积没关系。”他伸伸懒腰，打了个哈欠，“睡吧，莉拉妮亚。”

“晚安，基里尔。”她的声音像个孩子一样轻。“我希望能梦见你的德国。”

半夜里，门轻轻地开了，塔玛拉溜了进来。

她像小时候一样钻进莉拉的被窝，蜷在妈妈的怀里。

“我害怕，妈妈，”她轻声说，免得吵醒爸爸。“我怕这些陌生人，怕这个陌生的国家。”

“我也一样，我的乖女儿，”莉拉·保罗夫娜小声回答，“可是不要说，不要流露出来！做一个快快活活的小姑娘。这是爸爸的家乡……你一定要尊重它……”

这一天是以官方的询问开始的，接着是填写长长的调查表，拍照，贴在被叫做身份证的识别卡片上，还有为继续旅行做准备。大多数移民者的情形都比库恩贝克一家简单，他们有亲戚可投靠，或者被安置到农场去，在那里他们会很快适应的。手工业者则被安排进工厂，也就是所谓的转岗培训企业，让这些后移民者——一个多好看的德国官方词汇！——受到转岗培训，然后投入劳动。国家会帮助这些新德国人，直到他们完全适应。

到阿斯加德·库恩贝克这里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

他是最后一个被叫进办公处的，省略了所有程序，他被直接带进一个房间，一个男人正在等他。这个人穿着一件质地精良的浅蓝色上衣，中等年纪，高高的额头，一双深邃的眼睛，棕色头发按照流行的式样留得很长，比库恩贝克在弗里德兰看见的任何官员的头发都长。库恩贝克刚跨进门，他就跳了起来，微微地鞠